

论唐贞元、元和时期诗歌复古思潮

高玉昆

考察唐诗的整个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无论在诗歌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复古思潮都很突出。表面上看，唐诗是直接承继六朝诗歌的成就，呈显出清新宏丽的诗风，特别是近体诗的创作取得极高的成就。但在这条诗歌发展潮流旁边，复古思潮也是需要我们正视、认真把握的一条唐诗发展主线，有时在唐诗历史上甚至占主导地位，使唐诗艺术登上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早在唐代，唐诗选家们就已注意到这种现象。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说自己的选诗原则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①。其《集序》谓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再阐今日”^②。指出“尊古”的现象及作用。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说开元之际的诗人们，“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因而诗坛“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③。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自称选诗标准为“格、律兼收”^④。

“格”，指“格诗”，即古体诗。晚唐人顾陶《唐诗类选序》中说：“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於时，群才莫得而问；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

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爰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系其数，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⑤。论述了唐诗发展中“反古”诗人与“律体”诗人的各自成就；认为得“风骨”，抑“浮伪”，复古诗人之功大矣。可见，“反古”与“律体”两种因素在唐诗发展中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使唐诗艺术既有清新宏丽的风貌，又不失苍劲古朴的气质；既改变了以往诗歌古直无华的面容，又洗涤了齐梁以来浮艳靡软的粉霜。两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唐诗发展中齐头并进。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又各有自己的兴衰变化，在不同时期有主有次。在贞元、元和（785—820）年间，复古思潮在诗坛占据主导地位，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使我们更能深入地了解唐诗发展的规律，深刻地把握唐诗艺术的成就。

—

贞元、元和时期诗家竟出，作品繁

盛，路数各异，如有贞元前期吴中诗人皎然、秦系、陆羽等人的清丽诗篇，有元和初李绅、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但数量都有限，不是连续长期的、地域广泛的创作。从整体上看，这时期大部分诗人是运用古体诗形式，贯穿先秦汉魏诗歌传统，创作复古倾向很重的诗歌。可以说，唐诗发展中“反古一律体”二者的摆动在这35年间是绝对偏向“反古”的。

顾况“性背时人高且逸，平生好古无俦匹”（皎然《送顾处士》），曾感叹“茫茫古道，不见来者”（《监察御史储公集序》），称赞陶翰“行在六经，志在五言”（《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反对“文彩之丽”的诗风（《悲歌序》），在贞元三年（787年）至五年间，继承《诗经》的讽谕精神和四言形式，写下《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韦应物的诗歌创作具有复古倾向。宋代魏泰谓其“古诗胜律诗”^⑥。韦应物的《拟古诗十二首》用闺怨离思题材抒发情感。其《高陵书情》诗说：“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清人刘熙载说“此可与《春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⑦。韩愈在贞元时与古代贤人旷百世而相感，其《复志赋》说：“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朴，划伪以真”（《新唐书·韩愈传》）。他在《秋怀》中抒发读古诗时的感叹：“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共言有感触，使我复凄惨”。自称“先王遗文章，缀辑实在余”。在贞元、元和间写下《杂诗》《嗟哉董生行》、《谒衡岳庙》、《石鼓歌》、《琴操》等很多复古诗歌。李观、欧阳詹和韩愈同在贞元八年登第，天下谓之“龙虎榜”。李华自称“洁身复古，立行师古”

（《与睦州独孤使君论朱利用见书》），诗文创作上反对“焦气力、劳形神、润饰言辞以自贤”（《上陆相公书》），是韩愈的同志者，也是孟郊诗歌“出俗韵”的“知音”（孟郊《哭李观》）。欧阳詹曾于贞元十五年举荐韩愈为博士，不成。与韩愈交往，二人“相知为深”（韩愈《欧阳生哀辞》），继承先秦诗歌的比兴艺术传统，写下四言古诗《东风》、《有所恨》等诗。

柳宗元与韩愈为友，少时“下笔构思，与古为侔”（《旧唐书》本传），其《答贡士沈起书》说：“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曾运用秦汉时三四言诗体写下“取晋魏义，用汉篇数”的《唐铙歌》（《唐铙歌表》），用古语，叶古韵。李翱受业于韩愈，“博雅好古”（《旧唐书》本传），力矫“多对偶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的“时世之文”（裴度《寄李翱书》）。孟郊“行古道，处今世”，“其心追古人而从之”（韩愈《与孟东野书》），“好古天下钦”（韩愈《孟生》），为韩愈所奖引。他仰慕盛唐复古诗人孟云卿、元德秀（《吊元鲁山》、《哀孟云卿嵩阳荒居》），其《寄陕府邓给事》说：“自谓古诗量，耻将新学偏”。《送崔爽之湖南》诗中不满时俗诗风：“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游韦士洞庭别业》诗中称赞友人“文高追古昔”。继承风雅比兴的传统，致力于五言古诗的创作，如数组《秋怀》诗，艺术成就很高。卢仝的诗亦多古体，孟郊《答卢仝》诗称为“君文真凤声，宣隘满铿锵”。刘叉亦主张诗歌复古，他称赞别人的诗：“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寄赠含曦上人》）。其《勿执古寄韩潮州》诗说：“请君勿执古，执古徒自

隳”，对韩愈复古主张的不遇感到愤慨。又视孟郊为同路人：“退之何可骂？东野何可欺？”“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答孟东野》）。张籍“能为古体诗”（《旧唐书》本传），贞元时多写古乐府，贞元十四年韩愈《举荐张籍状》说他“文多古风”，并加以奖掖。鲍溶有《夏日华山别韩博士愈》、《将归旧山留别孟郊》诗，与韩愈、孟郊为文字交。他“叹息追古人，临风伤逝波”（《经旧游》），多用五古体裁作诗，“古诗乐府，可称独步”^⑧，其《秋怀五首》、《感兴》、《秋思三首》等均为古朴的咏怀之作。沈亚之常游于韩愈门下，与鲍溶交往颇多^⑨。他在《与京兆试官书》写道：“去年始来京师，与群士皆求进，而赋以八咏，雕琢绮言与声病，亚之习未熟，而又以文不合于礼部，先黜去”。^⑩不为绮言声病之作，诗风古朴。诗人王胶曾为韩愈所举荐，“其歌诗高处用古人”（皇甫湜《送王胶序》）。

韩愈《送李础序》、《卢尉墓志》中说李、卢二人当时皆有诗百千篇在世。李贺多运用古体抒发抑郁愤恨之情，如《咏怀二首》、《感讽》。陈商被贾岛称为“君子荒榛中，寻得古辙行”（《送陈商》）。张碧曾得到孟郊的赞扬，其《农父》同情百姓的疾苦：“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野田行》、《鸿沟》在咏叹秦汉古事中揭露现实的混乱与黑暗。吕温疾呼“儒风不振久矣”（《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在《裴氏海昏集序》中不满“南皮之诗”、“金谷之诗”，主张恢复“昔者三代陈诗，以观民风”的传统，称赞“婉而有直体，曰比曰兴，近而有深致”的诗风。与孟郊、张籍友善的于鹄、刘言史亦多古体创作，刘

言史有志于“修文返正风，刊字齐古经”（《初下东周赠孟郊》），其诗被孟郊称为“可怜大国谣”（《哭刘言史》），引为同调。白居易在贞元、元和时也多写古体诗，如《秦中吟》等。元稹元和十一年（816年）在通州整理旧诗稿，列出“古讽”一类（《叙诗寄乐天书》），其《阳城驿》、《四皓庙》诗，“诮”、“讥”时事，颇为尖深。

总之，贞元、元和间，以韩门子弟、友人为主，诗歌复古思潮蔚为风气，汇成潮流，其势足以抵敌“律体”诗风的流行。

二

肯定贞元、元和诗歌复古思潮的业绩，是因为与唐代其他时期诗歌复古思潮相比，它在思想内容上有新的特点，即侧重于讽刺美刺时政，不满现实混乱，悲叹时代颓败。这都为唐诗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血液。

孟郊曾认为：“不待位而言，大道之言也”（见独孤郁《答孟郊论仕进书》），认为应象古人那样，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时清则庶人不议。生活在一个变动的时代里，就应关心现实，讽谕时政。他称赞别人的诗：“昔咏多写讽，今词讵无因”（《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其理想是“何当补风教，为荐三百篇”（《送魏公入朝》）。他的创作思想概括了贞元、元和诗歌复古思潮的首要特点。

卢仝写《月蚀诗》，前人多认为有具体的本事，或说“讥切元和逆党”（《新唐书·卢仝传》），或说“嫉宦官之蔽明”（见何焯《义门读书记》、方崧卿《韩愈年谱增考》等），或说讥李忠臣，或说讥吐突承璀（见洪迈《容斋随笔》），

更多的人以为怪涩无益。其实，这首诗是在神话传说的瑰丽奇诡的色彩中讽谕唐朝君王，借一次月蚀的亏盈来抒发自己的忠臣之心，表达对唐朝命运的忧虑与希望。诗中写道：“吾恐天似人，好色即丧明”。

“二帝悬四目，四海生光辉。吾不遇二帝，滉漭不可知”。“人养虎，被虎啮。天媚嫫，被嫫瞎。乃知恩非类，一一自作孽”。

“想天不异人，爱眼固应一”。卢全是位钻研《春秋》三传的学者，他受《公羊传》及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⑩，借天象以喻时政，是可以理解的。况且以“日”、“月”喻德、喻君，从《诗经》开始就是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传统。《诗·小雅·十月之交》写道：“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可见，《月蚀诗》把日月、神话与君主、人间交错抒写，其讽谕意义是明显的。他在《感古》诗中的寓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主题：“可怜万乘君，聪明受沈惑。忠良伏草莽，无因施羽翼。日月异又蚀，天地晦如墨”。卢全对君主的被蒙蔽深感不满与忧虑，《月蚀诗》中说：“地上虮虱臣全告憩帝天皇，臣心有铁一寸，可剗妖蟆痴肠”。“敢死横干天，代天谋其长”。希望皇帝聪慧、改过，致天下太平，如孔子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⑪卢全盼望唐朝君王能除弊延祚：“愿天完两目，照下万方土。万古更不瞽，万万古，更不瞽，照万古”。因此，后人指出：“《月蚀诗》亦是忠爱热血，诡托而出，盖《离骚》之变体也”^⑫，“是一篇感情强烈锋芒犀利的讽刺诗”^⑬。

韩愈的《南山诗》抒发了自己为国效力的愿望，讽刺了当时京城朝中的世态人

情。元和元年（806），韩愈从南方贬所北还，因无由及时入朝，满怀怨望之情。在江陵时抱怨“我材与世不相当，戢鳞委翅无复望”（《赠郑兵曹》），自称“诗书渐欲抛，节行久已惰”（《感春四首》）。归京后，他“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归愚识夷途，汲古得修绠”。“胡为浪自苦，得酒且欢喜”（《秋怀诗》）。但在这些牢骚之外，他的思想还有积极的一面。其《感春四首》说：“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寒食日出游》说：“题诗尚待笔锋劲”。《秋怀诗》说：“尚须勉其顽，王事有朝请”。欲再鼓壮志，入朝问政。《南山诗》即写于这种思想状态下。在隋唐诗歌中，“南山”多作为一种意境，熔入诗人清高淡泊的情感。如隋代胡师耽《登终南山拟古》诗中厌恶京城权贵，“结庐终南山”。王维《终南山》说：“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张九龄《在郡秋怀》写道：“挂冠东都门，采蕨南山岑”。但在古代诗歌传统中，“南山”还有比兴的作用。《淮南子·道应训》载：“甯戚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甯戚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歌曰：

‘南山粲，白石烂，短褐单衣长止鞚。生不逢尧与舜禅，终日饲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韩愈继承发展了“南山”的这种比兴意义，赋予“南山”以新的意义，表达一种入世问政、怀才遇时的情感，不是淡泊隐逸之情，而是讽谕奋发之语。诗人遭贬出京时，路过终南山，与同伴张署“夜息南山”，“同卧一席”（《祭张员外署》），心情凄苦。还京时又经过终南山，《南山

诗》写道：“昨来逢清霁，宿愿忻始副”。情绪开朗、明快，施志于物之情油然而生。后写南山四时之变，又写南山的亘连山势：“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雉。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凑。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或乱若抽筍，或嵲若注灸。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或罗若星离，或翥若云逗。或浮若波涛，或碎若锄耨。……”。句首用“或”字的句子数十个。《诗·小雅·北山》曾连用十二个“或”字句：“或燕燕居息，或尽瘁国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表现不同志趣的君子与小人。韩愈继承发展了“或”字句的这种比兴含义，在《南山诗》中刻画出很多一正一反、相互对立的两种情形与意象，具有明显的褒贬、讽谕意义。《文心雕龙·比兴》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⑯。《南山诗》就具有这种切类指事、依微拟议的特色。明代恽敬《沿霸山图诗序》也指出了《南山诗》这种“比形类情”的特点。后人说此诗“如烂砖碎瓦，堆垒成丘耳，无生气，无情致，无色泽”^⑰，或说它“刻画山水，可以不作”^⑱，也有人说此诗只学拟汉大赋的铺排，是文字游戏，是庞大的艺术废品。这都低估了《南山诗》的价值。

贞元、元和复古诗歌也有赞美善政亲民的官吏的内容。柳宗元《送从兄俱罢选归江淮诗序》说：“闻善不慕，与聋聩同；见善不敬，与昏瞽同；知善不言，与嚚喑同”。代表了复古诗人的美刺观点。孟郊《吊元鲁山》诗赞美了元德秀有利民众的政绩：“言从鲁山宦，尽化尧时心。豺狼耻狂噬，齿牙闭霜金。竞来辟田土，相与耕嶮岑。常宵无关锁，竟岁饶歌吟。

善教复无术，美词非俗箴”。这类诗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贞元、元和复古诗人痛恨时风大丧。韩愈《石鼓歌》作于元和六年（811年）河南县令任上。石鼓是周代文物，纪周宣王狩猎之事。周宣王是中兴、复古之主。《史记·周本记》载：“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石鼓歌》诗希望唐宪宗能象周宣王那样了解古物的贵重价值，谏议不要“掎摭星宿遗羲娥”，不要抛弃象日、月那样的宝物，进而遵古道、整纲纪、致太平。诗人愤慨时人轻视传统的东西，只重时髦：“羲之俗书趁俗媚，数纸尚可博白鹅”。诗末极富感情：“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这比起宋代苏轼《石鼓歌》以叹息人生不及石鼓长寿作结，要深挚得多。可见，韩愈的《石鼓歌》不是有人所说的，是艰涩的考古报告，而是一首缘事而发、感情深沉的抒情诗。

“贞元之风，好佞恶忠”（《旧唐书·卢杞等传赞》）。贞元时，唐次被贬，“在巴峡十余年不获进用。”“久滞蛮荒，孤心抑郁，怨谤所积，孰与申明，乃采自古忠臣贤士，遭罹谗谤放逐，遂至杀身，而君犹不悟，其书三篇，谓之《辨谤略》”（《旧唐书》本传）。元和时，沈传师类例广之，著成《元和辨谤略》。可见人们对谗谤这种政治弊病极愤慨。当时，李观作《交难说》，韩愈作《原毁》，柳宗元作《谤誉》。这种愤慨在复古诗歌中也很突出。孟郊《湘弦怨》说：

“嘉禾忌深蠹，哲人悲巧诬。灵均入回流，靳尚为良谋。我愿分众泉，清浊各异渠”。又《君子勿郁郁有谤毁者作诗以赠之》说：“君子勿郁郁，听我青蝇歌。人间少平地，森耸山岳多。折辀不在道，覆

舟不在河。须知一尺水，日夜增高波。叔孙毁仲尼，臧仓掩孟轲”。愤恨恶谤忠贤的时风。卢仝《感古》诗也是这样的主题：

“苍蝇点重棘，巧舌成锦绮”。“假如屈原醒，其奈一国醉”。“万世金石交，一饷如浮云。骨肉且不顾，何况长羈贫”。

批判唐朝政治的黑暗与弊端。贞元、元和复古诗人不满上层统治者崇尚佛教对国计民生的危害。韩愈《送灵师》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诗人们也抨击了朝政弊病丛生，给百姓造成巨大苦难。韩愈《归彭城》写道：“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讴謨者谁子，无乃失所宜。前年关中旱，闻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其《赴江陵途中》写道：“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呻尤”。马异《贞元旱岁》反映灾年人民的疾苦：“赤地炎都寸草无，百川水沸煮虫鱼。定应熯烂无人救，泪落三篇古尚书”。刘叉《雪车》诗揭露朝廷权贵不顾百姓饥寒死活，只顾驱运冰雪入深宫以备夏天御炎热的行为：“岂信车辙血，点点尽是农夫哭。刀兵残丧后，满野谁为载白骨。远戍久乏粮，太仓谁为运红粟”。诗人愤慨道：“相群相党上下为蟊贼，庙堂食禄不自惭。我为斯民叹息还叹息”。韩愈的《泷吏》诗借昌乐泷吏之口抨击朝政破弊：“不知官在朝，有益国家否。得无虱其间，不武亦不文。仁义饰其躬，巧妍败群伦”。

元和时，刘闢叛乱，宪宗想“舞干以化之”。元稹《论讨贼表》极力反对：“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矣，陛下犹耸之以名爵，导之以训诰。崇之以宠章

而不至，假之以旄钺而益骄”。“善则善矣，则如天下之情何！”后来，唐廷虽诛刘闢，但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又怕得罪诸镇节度，故对诛刘闢之事讳莫如深，不许民间宣扬。西川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不许成都俳优似演《刘闢责买》戏，说：“闢是大臣，谋反。非鼠窃狗盗，国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辄为戏弄！”并“杖优者，皆令戍边。”^⑩而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却以正笔写此事，寓有对唐廷姑息、讳言刘闢叛乱的反对，具有批判朝政的进步意义。诗中曾渲染斩杀刘闢的情景：“婉婉弱子，赤子伛偻。牵头拽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柱。末乃取闢，骇汗如雨。挥刀纷纭，争割脍脯”。苏澈说：“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⑪。没有看出韩愈这些诗句具有惩除割据叛乱、讽刺朝政的寓意。《旧唐书·刘闢传》载刘闢“磔裂”食人之事，《元和圣德诗》也有刘闢“血人于牙，不肯吐口”的诗句，揭露了地方藩镇的暴虐。可知此诗正如韩愈在诗序中所讲，是“指事实录”。清人王寿昌也称其为“切实缔当之至者”^⑫。钟嵘曾说建安诗人应璩“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⑬。《元和圣德诗》正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透过其称颂唐廷功德之辞，可以触摸到其批判朝政的含义。

三

贞元、元和间的特定时代背景，为这时期诗歌复古思潮的兴盛，提供了成熟的客观条件。首先，这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在进行变革。贞元二年(786年)，德宗结束避乱，驾回长安，降李希烈、平朱滔，结束了自安史乱后到贞元

时河北、山东的兵乱。到贞元后期，北方战事亦平定。德宗为了维护“和平”局面，在经济上实施“两税法”，使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农业得到恢复，出现所谓“太平”的局面。到元和时，宪宗加紧削藩，平淮西、定西川，国家局势相对稳定。这种“中兴”局面，使大乱后的上层统治者产生了一线复兴的希望，也促使他们重新考虑唐王朝的前途，朝廷内部的政治人事、外部的各项政策也必然有一番改革与变动。其次，这时期虽号称“和平”、“中兴”，但社会的各种矛盾亦趋于暴露，如白居易当时所说：

“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亦生于兵”。 “赋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类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各派系间的政治斗争更加激烈。总之，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一个既“中兴”又“中衰”的时代，一个亟待变革的时代。贞元、元和之交的“永贞革新”正是这种时代要求的集中爆发。

在诗人们的主观方面，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们盼望国家走向坚稳。为了改革现状，实现安平的社会理想，他们重新考问历史，寻找现存社会的根，探索自古以来历史进展的原因。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只能从古昔社会中寻求理想，希望能恢复历代人们理念中设想的、而实际上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古代尧舜太平社会。这导致诗人们把社会改革与复古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说：“常念古之人日已进，今之人务利而遗道”。刘叉《野哭》诗感叹道：“哀哉异教溺颓俗，淳源一去何时还”。他们在古代儒家典籍中寻求医治败弊社会的良药秘方。韩愈说自己“生平企仁义，所学皆

孔周”（《赴江陵途中》），“我身蹈丘轲”（《赠张籍》），主张“柄任儒术崇丘轲”（《石鼓歌》）。他著有《注论语》十卷，还与李翱合作《论语笔解》。

在这种背景下的新思想、新感情，给唐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变革的时代也给诗坛带来了新的任务，即要开辟唐诗发展新的道路、新的诗风，更好地表现新的时代风貌。正直的诗人们必定要在诗中表达他们的忧虑、悲愤及希望。独孤及曾说：“识恶而不言，是使天下之为恶者不思其惧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为善者不劝其善也”（《答孟郊论仕进书》）。因而，关切现实、讽谕时政的诗篇必然会产生。但是大历以来的近体诗风不能充分表现新的时代内容。在政治思想上，诗人们认为远古社会是改革现实的楷模，与此相应，出于对讲究声律、无关时事的近体诗风的不满，诗人们进而在古代诗歌传统中去寻求诗歌艺术的典范，追摹古昔圣贤之作。先秦汉魏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感遇咏怀、美刺时政，在艺术形式上不拘声律，多用比兴、寄托及象征的手法抒写情感，有其近体诗传统所无法比拟的艺术生命力，这正是贞元、元和复古诗人们所追求、向往的。在对社会政治的讽谕中，在与近体诗风的对立中，诗人们需要一个向导，他们终于在古代诗歌中找到了这个向导，并在其中重新认识了、重新发现了新的价值，吸取了富有生命力的因素。韩愈叹道：“古声久埋灭，无由见真滥”（《秋怀十一首》），主张“游乎《诗》、《书》之源”（《答李翱书》）。这正如《文心雕龙·通变》所讲：“矫讹翻浅，还宗经诰。”^②

总之，贞元、元和间这个唐朝历史上转折时期的社会变革及社会危机，带来了诗歌复古思潮的兴盛。孟郊说得好：“文

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于贤人。由于时政”（《送任载齐古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序》）。诗歌艺术上的复古思潮与美刺时政、改革现实的时代需要，这二者紧密相连。近代改良主义陶曾佑指出：“文字收功日，全球改革潮”^③，一语道破中国文字发展中文学兴衰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当然，其中也有诗歌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但只有紧紧把握住贞元、元和间社会政治全面变革这个核心因素，才能深刻理解当时诗歌复古思潮兴盛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唐诗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问题，一个唐诗如何健康发展下去的问题。

四

探讨了贞元、元和年间这个“中兴”与“中衰”相交错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这时期诗歌复古思潮的实质就是要恢复先秦汉魏诗歌讽谕美刺的传统，“邀当局之垂听，谋现状之改进”^④，继续发展唐诗艺术。

复古诗人们并没有逃避在古书古诗中，而是了解古往理乱之所由，有志于用世问政，干预现实，正是“明古以论今”（元结《与韦尚书书》），“学古所以行于今”（陆贽《策问博通典故达于教化科》）。韩愈自称“绝意于神仙”（《杂诗四首》），不语世外仙道，其《记梦》诗说：“乃知仙人未贤圣，护短凭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他也反对逃于醉乡，脱离现实，其《送王秀才序》说：“颜氏子操瓢与箪，曾参歌声若出金石。彼得圣人而师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可曲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邪？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他以古贤自比，有志作为，《感二鸟赋》说：“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于

无位”。面对贞元时天下兵乱未平、关中旱灾、东郡水祸的现实，他说：“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归彭城》）。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新唐书》本传），上疏请免旱饥的关中赋税，后又谏迎佛骨，以致贬谪阳山、潮州。他不仅“学无不该实”，而且“吏治得其方”（张籍《祭退之》），任袁州刺史时曾放免奴隶七百多人（见其《典贴良人男女状》）。柳宗元主张“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送徐从事北游序》），继承当时具有现实精神的啖助、陆淳一派《春秋》学的思想（见《陆淳墓表》、《答元饶州春秋书》），积极参加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永贞革新；还提出官非“役民”，而是官被民役的观点（《送薛存义之任序》）。他被贬岭南，终身不得北归，但他始终不忘用世之心。在柳州四年中，他废除残酷的人身抵押制度，减轻徭役，兴办教育（见韩愈《柳州罗庙池碑》），努力“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寄许京兆孟容书》）。卢仝也是有政治抱负的，其《蜻蜓歌》说：“吾若有羽翼，则上叩天关，为圣君请贤臣，布惠化于人间。”

因而，他们的复古诗歌不是为了给诗歌增加一点古雅高贵的色彩，不是超脱现实世界，抒发一点儿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使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联系得更紧，以讽谕现实社会。他们的诗歌有着切实的现实内容和进步思想，是严肃的志士之作。柳宗元《与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说：“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认为诗歌应是诗人志略的表

现，应是感激愤慨之词。孟郊《晚雪吟》诗说：“今朝前古文，律异同一调。愿于尧琯中，奏尽郁抑谣”。即要学习古诗艺术，写出类似司马迁那样“发愤以抒情”的“郁结”诗文。柳宗元《古东门行》借汉乐府题意讽谕元和十年六月武元衡被盗杀之事。李贺《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诗写道：“邺城中，暮尘起。探黑丸，斫文吏。棘为鞭，虎为马，团团走，邺城下”。借古讽今，抨击暴吏的专横跋扈。《旧唐书·元白传论》说贞元、元和时，“向古者，伤于太僻”。僻，即偏，不合一般的常理。韩愈自谓“已行颇僻，与时俗异志”（《上考功崔虞部书》），其诗也是如此。可以说，“僻”字表示了贞元、元和诗歌复古思潮实质的一个方面，即多讽谕激愤之词。而这种内容是不受皇族权贵们欢迎的。擅长骈体属对、柏梁陪燕的令狐楚献《御览诗》，其中不选韩、孟诗，而多选卢纶《天长久辞》一类近体新声，恐怕也是为了投合上层统治者的好恶，因为韩孟等复古诗人的作品内容

注释

①郭绍虞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②同上，第67页。

③《全唐文》清刊本，卷459。

④同①，第72页。

⑤同③，卷762。

⑥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第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⑦《艺概》卷2《诗概》，第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⑧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5，清《指海》本。

⑨见《沈下贤文集》卷8《送杜德序》，《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

太“僻”，听不顺。

综上所述，贞元、元和诗歌复古思潮追慕古代诗风，不是为了回避现实，回避诗歌艺术的发展；也不是拣起旧的形式，勉强模仿古诗，写些古板的死诗；而是为了提高诗歌创作中讽谕时政、批判现实这一作用的地位，给唐诗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新的气质，开创唐诗艺术的新境界。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了解贞元、元和诗歌复古思潮，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创新与复古的关系，发展与继承的关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是在对以往文学传统的扬弃中，在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的过程中迈出新的步伐。古代是这样，今天亦如此。“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⑩。当代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创新，不可能、也决不能抛掉以往的文学传统，特别是不能抛掉文学传统中的优秀方面。只有正确地继承发展以往的文学遗产，才能开辟文坛的繁荣昌盛之路。

⑩《沈下贤文集》卷8。

⑪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7章，第3节。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⑫《论语》《子张篇》

⑬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10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⑭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311页。

⑮刘勰《文心雕龙》卷8，《四部丛刊》本。

⑯清庞垲《诗义固说》下，《清诗话续编》，第738页。

⑰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984页。
(下转第25页)